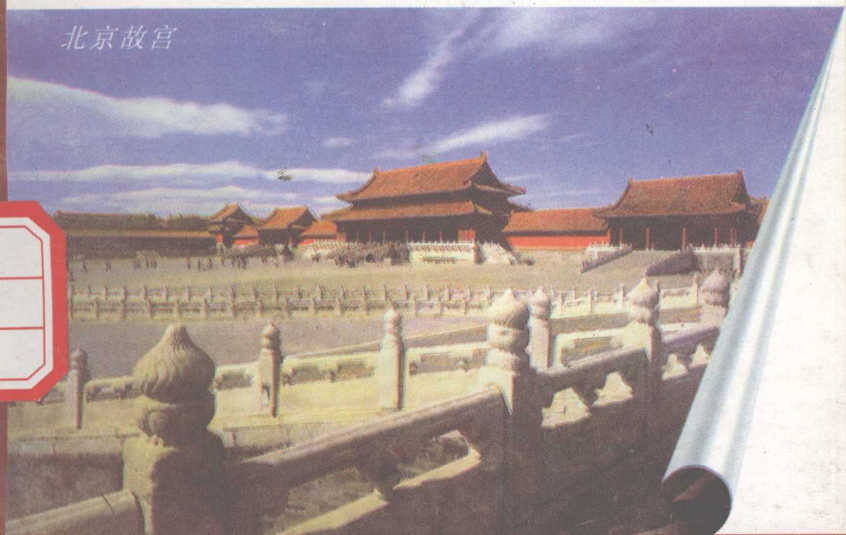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 康熙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北京故宫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 康熙小传

巴山氏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梁 坚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康熙小传

巴山氏 编著

---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2001年10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2次印刷

ISBN—80521—843—9/K·113

I定价: 136元(全20册)

# 目 录

|              |      |
|--------------|------|
| 一、御极执政 ..... | (1)  |
| 二、平叛收台 ..... | (16) |
| 三、保疆抗俄 ..... | (34) |
| 四、治蒙安藏 ..... | (47) |
| 五、清廉勤政 ..... | (64) |
| 六、弘文理旗 ..... | (81) |
| 七、求知终老 ..... | (98) |

## 一、御极执政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是清朝的一个十分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执政六十一年，一生中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这本康熙小传就是想把康熙大帝一生中的各种功业大致作点描叙，看看这位清朝定都北京之后的第二个皇帝是如何建立起他的文治武功的。

先从康熙的御极执政说起。

爱新觉罗·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从呱呱落地起，就由若干乳母来抚养。小时候，康熙就长得五官端正，双目有神，举手投足，常含庄重，因而得到了他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承欢膝前，也得到了祖母的亲自教导。皇太后按照帝王的行止标准及文化素养严格要求玄烨，为他后来的登基执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康熙的父亲顺治皇帝却不怎么喜欢这个三皇子。顺治帝很有些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脾气。康熙的母亲是佟妃，但由于顺治帝后来喜欢上了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十八岁的董鄂氏，便对佟妃十分冷

淡，并借口说康熙小时候没有出过痘，只准保姆带着康熙在紫禁城西的一座府第里生活。董鄂氏曾经生过一个皇四子，这个皇儿深得顺治皇帝的欢心，但三个多月就死了，此后董鄂氏身体不好，不能再生育。由于这种情况，玄烨在皇太后的维护之下，处境才渐渐有所改善。五岁的时候，便依清朝的规矩随众上朝，站班当差，并在书房认真地读书了。在听说祖辈艰苦创业的故事之后，玄烨便暗下了决心，要做一个披坚执锐的英杰。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由于患天花在养心殿中逝世了。他死之前，曾想把二皇子福全选成皇位继承人的，但由于福全没有出过天花，无免疫力，所以只好接受了其它臣属的规劝，按母后（孝庄皇太后）的意图，把皇位传给了三皇子玄烨，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大帝。这一年，玄烨才8岁。正月初九，玄烨在太和殿御极登基，定年号为“康熙”。“康熙”这个字在满文中是安定太平的意思。

康熙即位后，就把祖母尊为太皇太后，尊生母佟氏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为皇孙能稳坐帝位作了很多事情，经常指导幼帝康熙学会亲自执政。她告诉康熙说，成为一国之主，必须明白“得众则得国”的

道理，百姓安乐富庶，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康熙虽然年幼，却真是没有辜负老祖母的教诲，时刻注意修养自律。10岁的时候，曾有一个大帅将一只黄鹦鹉装在黄金做成的鸟笼里送给康熙玩，就被康熙拒绝了，康熙同时还将那个大帅狠狠地斥责了一顿。

康熙初登基做皇帝，由于年纪小，便有四个亲信大臣根据顺治帝的遗诏和太皇太后的意图来辅助少年皇帝处理政务。前后佐理的时间是8年零5个月。四个辅佐大臣分别叫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四个大臣中，索尼、鳌拜、遏必隆都是太宗皇太极的旧部，早年就跟随太宗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太宗去世后，他们又拥立皇子福临即位，使他成为顺治帝。苏克萨哈本是睿亲王多尔衮的属下近侍。他们四人在反对多尔衮的斗争中，都坚定地站在顺治帝及孝庄皇太后站在一边，深得信任与赏识。因此，顺治皇帝在弥留之际将索尼等四人任命为辅政大臣。四个大臣辅政后怕引起诸王的不满，曾用邀诸王共同辅政的话来试探。由于他们的权重功高，诸王不敢答应，只连说先皇帝深知四位大臣的忠心，所以将国家重务托付给你们，遗诏上写得明明白白，没有人敢来干预。劝四位大臣不要辞让。于是，索尼

等四个大臣便宣誓就职了，表示如果不竭忠效力，胡作非为，或者结党营私、挟仇诬陷等，便一定要被“夺算加诛”。这时，一个新的统治核心便形成了。

辅政大臣的设立，可以有效地防止诸王干政，有利于保护皇权，并能使皇太后实际上参与决策国家大政，非常适合太后辅助幼孙登基为皇。

四大臣辅政时期制定的许多政策都有利于清室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比如说辅政初期，他们革除了内官 13 衙门，恢复了内务府，只留少数太监供使令，有效地防止了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重设理藩院处理外藩事务，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一些政策来缓和汉族地主和满族贵族之间的矛盾，如决定对民间土地，不许再圈，修改《逃人法》，使得逃人可以被抓获，小民可以不受讹诈等，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由于辅臣制度本身也是初定未安，也常有代替和侵犯其它正当机构以至皇帝职权的地方。比如说，四辅臣有代替大学士为皇帝起草疏章初步批复的权利，代替大学士在皇帝身边值班，甚至还要直接代替皇帝执行批红颁旨。凡此种种，当则无不可，但天长日久，就为辅臣鳌拜后来各种场合搀杂私意、专权乱政提供了可乘之机。

索尼位居辅政大臣之首，是四朝元老，一等伯，深受孝庄皇太后的信任与赏识。四大臣中班次居第二位的是苏克萨哈，爵秩较低，但一旦索尼归天，他便可以升到索尼的位置，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因此引起了鳌拜的不满。他是清朝开国大臣费英东的侄儿，由于作战勇敢，军功卓著，以至累至升为内大臣，位至爵。居功自傲，盛气凌人。遏必隆也是开国功勋之臣的后代，位列公爵，加上与鳌拜都是黄旗中的大臣，便常常与鳌拜彼此附合，与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形成了对立，遇事常常争吵不休，积怨成了仇。

鳌拜等人目无康熙，擅权自专，最初体现在更换圈地挑起事端的事情上。鳌拜为了拉拢黄旗中人以打击白旗中人，在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正月，便用八旗土地原来分拨不当的借口，要求重新来一次圈换土地，写了一个申请移送户部，企图造成八旗纷纷要求重新圈换土地的形势，对太皇太后和年幼的皇帝施加压力。其目的，是想打击正白旗的力量。鳌拜的移文送到户部后，户部尚书、正白旗大臣苏纳海认为为了国定民安，上疏反对圈换土地，要求将八旗文驳回。鳌拜等人不甘罢休，即刻圈拨北京东北的顺义、密云、怀柔、平谷等四县的土地给

镶黄旗，造成圈换土地的既成事实。鳌拜的这些行动，遭到了朝野的许多反对与抵制。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各自上疏请求停止圈换土地，指出那是鳌拜背着少年皇帝搞的非法活动。被圈换出让好地的正白旗也在实际行动中不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鳌拜决定撕下脸皮，刀剑开路，强制推行。他矫传圣旨，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等大臣抓了起来，先革职，然后交给刑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康熙帝这时13岁，看到事态严重，便想出面调停，不同意鳌拜等人从重处理苏纳海等人的错误主张。但鳌拜、索尼、遏必隆等三人仗着自己在辅臣中的优势，诬指苏纳海等人有“不愿迁移，延迟藐旨”结党营私、抗旨背祖等罪名，急急忙忙就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绞死了。事情发生后，康熙提高了警惕，后来则更是明确他说，朱昌祚等人不但不应该杀，而且也不应该治罪。表明了他对这场鳌拜等人欺上压臣换地逞威事件的基本认识。从这件事后，康熙帝对鳌拜便开始有所戒备，听理政务便常常坚持正确的主张，有意抵制鳌拜一伙的各种行径。鳌拜有两个党羽叫阿思哈和泰必图的，当时在作吏部尚书和侍郎，他们根据鳌拜的意图，向皇上建议派人到各省去稽察，监视那里的总

督与巡抚。有一个叫冯溥的，当时在做吏部右侍郎，说这个提议不好，是对各省的督抚不信任。此言一出，泰必图就想老拳相向，上前去打冯溥。冯溥不退让，当场予以抵制。康熙帝及时地肯定了冯溥的意见，保护了冯溥。当时有一个内弘文院的大臣叫熊赐履的向康熙上了一个折子，折子中有对鳌拜一伙专权营私不满、提醒皇上注意的话。鳌拜见了这个奏折，大怒，要皇上治熊赐履一个妄言之罪，康熙帝当时就说，他在那里说的是国家大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将鳌拜的气焰打了下去。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时，他已经14岁了。朝内百官要求皇帝亲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索尼等也在这一年的6月上疏请皇上亲政。没几天，索尼就死去了。这一来，鳌拜便更加肆无忌惮，想乘机越位代替索尼之职，掌夺启奏权和批奏疏的特权，先是想乘康熙亲政前代皇上拟大赦天下的诏书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后又想拉苏克萨哈与他一起来掌持朝政。但这两招都没有得逞。康熙帝亲政之前叫其他的人密拟了大赦天下的诏书，绕开了辅臣，自主其事。而苏克萨哈也斥责了鳌拜，不同意拉帮结派，一心忠于皇上。鳌拜的野心受到了打击。

苏克萨哈得罪了鳌拜，鳌拜一伙便要寻找机会

陷害苏克萨哈了。由于苏克萨哈不愿意与鳌拜同流合污，但又势单力薄，斗不过他们，于是便产生了退隐的念头，于是便以身体不好为由，上奏康熙，说是要申请去守护先皇帝的陵寝。这个奏疏的另一个意图，是想用退隐辞职的行动来迫使鳌拜、遏必隆他们也能同时辞职。康熙帝由于年轻，未能及时明白苏克萨哈的一番苦心，想问个所以然。而鳌拜等却抓住这个机会大做文章，操纵议政大臣的会议，给苏克萨哈罗列了 24 条罪状，说他是奸诈欺饰，心怀异念，罪在大逆，要把苏克萨哈一家处以斩决磔死之刑。康熙坚决不同意这般处置，无奈鳌拜强奏不止，攘臂上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最后仅将苏克萨哈的磔刑改为绞刑，其家人也与他同被处死。鳌拜专权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苏克萨哈一死，鳌拜更想一手遮天，起坐班行，自动排在遏必隆的前面。若干政务要事，都是在自个家中商量好了就去实施推行。如果有人越过他直接向皇上报告，他便会大发雷霆。经常在皇上面前随意叱责部院大臣，对自己的同党却是恩厚有加。鳌拜有一个党羽叫马迺赛的死，康熙因为这个人没建什么大功，下令不准赐谥。鳌拜竟然抗旨，我行我素，仍赐给了马迺赛一个谥号。有一次，康熙的

硃红批本已发科抄了，鳌拜又把它取回来改批，冯溥知道了这件事，就报告康熙说：“本章既批红发抄，不便更改。”意在批评鳌拜的姿意妄行，鳌拜知道后，便想惩治冯溥，但康熙没有同意，反而表扬了冯溥。康熙与辅臣共同办公的时候，鳌拜常常心不在焉，东扯西拉与人闲谈，康熙便义正严词地批斥鳌拜，说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能不慎重，大家为国出力办事，万不可掉以轻心，表现出一个年轻皇帝不畏权奸独执大任的勇气与胆略。

鳌拜弄权专横，已成为朝室的心腹之患，但要除掉他，却又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得先做好种种准备。

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九月，内秘书院侍读熊赐履上疏说：“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并点明“天下治乱系宰相”（用宋人程颐语）暗示鳌拜是朝中大患，不除则国难安。由于当时各种条件尚未成熟，康熙便批评熊赐履，说他“妄行冒奏，以沽虚名”。实际上，这个时候康熙已在着手进行周密的擒拿鳌拜的准备了。为了麻痹鳌拜，康熙借口喜欢扑击游戏，便在宫中侍卫队伍之外，另外组织了一个善扑营，特选忠实可靠的侍卫和一千年少有力者，由康熙自己亲自掌握，善扑营随时听从康熙的

直接号令，为日后的擒拿鳌拜奠定了坚实有力的组织基础。奉命领导善扑营执行擒拿任务的是已故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的次子，名叫索额图，他以一等侍卫的身份跟随在康熙左右，威望足以镇住上三旗的其它侍卫。

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五月十六日，擒拿鳌拜的条件已经成熟。康熙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他问众人：你们都是我的左右臂，这样你们是惧怕我呢，还是惧怕鳌拜。众人一齐回答是怕皇上。于是康熙当众宣布了鳌拜的各种罪过，诱召鳌拜进宫，一当鳌拜进到毓庆宫里，康熙便令善扑营的大小侍卫将他捉拿了起来，前后过程干净利落。同时被擒的还有鳌拜的同党，另一个辅政大臣遏必隆。康熙举手言语之间，便将一当朝权奸收进网中，真是了不起。

鳌拜是几朝重臣，把他擒拿治罪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但康熙帝却做得从容不迫，威恩具显，前后处置，合起来不过十天时间。擒住鳌拜以后，康熙首先亲向议政诸王揭露鳌拜的诸般罪状，将近十条，一是徇情补用官员，结党营私，欺蒙皇上；二是在朝办事不求当理，经常叱喝群臣；三是对皇上说话不能声气平和，经常施威振众，高声喝问；四

是阻塞言语，阻挠其他臣官条奏于上；五是笼络官员，朋结奸党；六是凡事在家定议，而后施行，不守朝纲；七是依仗凶恶，弃毁国典，荐拔党羽，陷害忠良，等等。总之是上则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种种逆迹，十恶不赦。康亲王杰书等议政诸王支持皇帝拿问鳌拜，搜府侦勘，列出了鳌拜结党乱政的三十条罪状，建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其同党也应处以立斩立绞或凌迟处死之刑。

鳌拜已是罪在不赦了。这个时候，康熙帝再次表现出一个英明之主的理政治人之才，他再次召见鳌拜等获罪之人，历数了他们结党专权、紊乱朝政的诸般罪行之后，就宣布说：“鳌拜系勋旧大臣，受国厚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不意）鳌拜皆欺藐朕躬，恣意妄为……情罪俱真，本当依仪处分，但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且皇考曾经倚任，朕不忍加诛，姑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法外施仁，从容定夺。对于鳌拜的同党，康熙也是区别对待，遏必隆是开国勋臣额亦都的儿子，其母亲是和硕公主，康熙先是免其重罪，不久以后，又特地加以宽谅，让他有公爵之位，并宿卫内廷。至于鳌拜的另一些同党，如班布尔善、穆里玛等9人，康

康熙便因他们的“结党行私、表里为奸、擅作威福”的罪名处以死刑，这较之原来部臣列出的处死名单已是大为减少，从而避免了清除奸党而可能会产生的朝廷震动。

议处鳌拜之后，辅政大臣这一执政机构便已是风云不再，康熙也收回了批红之权。从此之后，各地奏折的朱笔谕旨，都由康熙亲自写定，从不让人帮忙。直到康熙年老，这一制度与习惯仍未被放弃。

革除鳌拜的工作一结束，康熙便为苏克萨哈、苏纳海等一批部省大臣平反昭雪。

这一年，康熙才十六岁，清室大权已牢牢掌握在他一手之中了。

康熙从躬亲大政开始，就坚持御门听政，勤勉认真，风雨不误。鳌拜在位时，这种直接接见臣下听取奏报是康熙反对权奸团结臣下的有效方式，除掉鳌拜后，这也是康熙考察官员优劣、了解民生国家的重要途径。康熙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春日，康熙有时到玉泉山巡视，前后几天，也是每天早晨按时在玉泉山内前亭听理朝政。夏天，康熙移住西苑南海避暑，也仍然不忘政务，每天一定要御门听政，从不耽搁。秋天，康熙要到北京永定门外二十里的南苑围猎习武，每天奔逐百余里，也仍

然要六部满汉大臣“仍如常进乾清宫启奏”。总之，亲理国政成了康熙每天的必作之务。康熙认为“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即使有时康熙有了自己的主张，在御门听政的时候，只要臣官的主张或建议正确，他也会择善而从，决不任意孤行。也正因为康熙听政厉始图终，从不懈怠，以至于奏疏中的错字他都能发现改正。有时一天的奏章达三四百件，康熙也都会一一读完，以便及时了解民事军情。至于说臣下处理政事时的敷衍塞责，不肯驳回某些陈辞滥调不可行的奏章，康熙也能明确提出要求，说徒劳无益的奏章反而会阻碍当行急务的正常进行，要臣官加以斟酌拒绝，从而使朝中公文处理的效率不至重复难决。

康熙在为皇执政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学习。他从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出发，对汉族的传统文化抱有浓厚的学习兴情。康熙8岁登基，便主动向太监张某、林某学习句读经书、书写汉字，那两位宦官同时还能康熙讲说前朝典制，使康熙获益匪浅。康熙八年，他还亲自到太学祀孔，并宣布恢复以八股文取士的旧制。除掉鳌拜之后，康熙立即着手举行经筵日讲，延请熊赐履、傅达礼、张贞生等来讲经侍读。康熙学得十分认真，十七八岁时（康熙九、十